

标签理论研究的转向：从学校教育到家庭教育

邢嘉月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标签”是基于社会结构的基本概念，以此标定越轨者的研究使标签理论的体系逐步形成。从社会学意义的标签理论到教育学意义的标签理论，其发展已不单纯囿于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当中。以标签理论为工具解释教育问题的视角在20世纪30年代已初露端倪，但主要集中于对学校场域下教育问题的阐释，较少涉及家庭场域中的教育问题。因此，对家庭教育问题作出新的阐释是标签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标签；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4.05.024

一、关于标签理论的研究

标签理论，又称标志论^[1]、烙印理论^[2]。标签理论与越轨行为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是一种研究越轨行为的方法，同时也是用以解释越轨行为成因的理论工具。人们之所以成为越轨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被作为政治和经济权威的他人贴上了这类标签^[3]。标签理论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与越轨社会学的研究紧密结合的解释框架。

（一）社会性：标签理论的产生前提

首先，标签是以社会结构为前提的基本概念，其产生离不开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首先见诸美国社会学家坦南鲍姆的《犯罪与社区》一书当中。一个人是否被认定为“越轨者”，不是由其本身的行为是否真的违反法律而决定，而由官方来认定^[4]。这说明，官方与社会意志在越轨行为的判定中远远大于个人意志的影响力。坦南鲍姆于20世纪30年代所作的这项研究为现代标签理论提供了第一个主要实例，也将标签理论研究的关注点导向了社会互动，而非个人越轨行为本身。随后，贝克尔在《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中，将标签理论正式引入了越轨社会学研究当中。贝克尔认为，越轨是由社会造成的^[5]。可以说，对标签理论的既往研究，始终未曾脱离过社会的背景与情境。

（二）双重性：标签理论的标定功能

其次，标签的性质与功能具有二重性。它既可制造越轨者，又可打造循规者；既存在负面标签，又存在正面标签。坦南鲍姆以“是否具备由权威标定的犯罪行为”来界定越轨者，这是从法律角度对“越轨者”及其外显行为进行认定。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勒墨特从更加宏大的社会道德意义上，将“越轨者”进行了更加具体化的分类，即“初级越轨者”与“次级越轨者”。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越轨”程度与动机。社会机构为规范社会秩序，甚至会通过逮捕等方式对其“越轨者”

身份进行更加清晰化的标定，使“越轨者”身份深入行为人的内心，从而自我界定为“越轨者”。即越轨行为越明显，则越轨标签越牢固。从此意义上来审视，标签理论的研究格外关注越轨者与非越轨者的社会互动过程，而非关注越轨者本身。

（三）规范性：标签理论的研究意义

最后，标签对偏差行为研究的意义在于“使人回到正轨”。“偏差”一词源于统计学，指“偏离平均水平过多的现象”。偏差行为即偏离了一定的社会规范、甚至与社会公序良俗背道而驰的行为，是一种非顺从行动。贝克尔从主观与客观两大角度，清晰界定了越轨行为的四种类型。“他人对该行为的反应如何”是主观层面的区分标准，“该行为是否客观上违背了社会规范”是客观层面的界定尺度。标签理论者以“越轨”这一词汇指代偏差行为，对标签理论的研究往往自外显的越轨行为而始，最终回到对越轨行为及其成因的解释之上。但是，标签理论研究的意义不可能止步于深度分析“越轨”行为，或者是对越轨者作出惩罚。其根本意义仍在于通过标签的社会控制作用，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减少“越轨者”的存在。贝克尔指出，一些场所的存在本身就将强化越轨行为所具有的偏差性，如监狱、精神病院、医院等^[6]。这样看来，个体是否会修正偏差行为，似乎是完全取决于诸多社会力量的驱动。但个体在标签的作用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偏差行为的维持是个体加入某些越轨者群体的结果，并不是其自身无意“回归正轨”。无论社会成员主动“回归正轨”，还是“远离正轨”，标签理论的研究都无法脱离以标签来调控社会成员之间互动的范畴，始终力图在互动中逐渐使人回到正轨。

二、标签理论视角下的学校教育研究

“标签”一词，较早见诸1931年问世的《违法经历的发展史》。率先将标签用于教育研究的是英国社会学

家里斯特。其中，当属《标签理论对学校教育过程的贡献》一文最为经典。

（一）越轨：学校标签的最终后果

学校标签的存在不仅标定了不同学生在学校场域下的角色与身份，而且缔造了一批越轨者。宋立从应试教育忽视学生道德品质发展的角度，用标签理论分析了青少年的越轨行为及其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扮演的角色。负面标签会催生学生更加强烈的逆反心理，甚至可能诱发青少年犯罪的行为^[8]。当然，犯罪是次级越轨阶段才有可能表现出的极端越轨行为，张爱梅则对一般性的青少年越轨行为作出阐释。在其研究中，更加突出了标签的标定作用对青少年行为的深远影响，重新标定青少年越轨心理及行为可以切实帮助青少年回归正轨。以上研究都从宏观视角重新审视了青少年越轨行为与标签之间的微妙关系。徐珏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当中另辟蹊径，将宏观意义上的青少年越轨行为缩小至微观意义上的校园欺凌。研究发现，不同学生遭遇校园欺凌的可能性不同^[9]，其原因可能是标签化的影响。此外，标签的作用是欺凌行为产生的越轨社会学原因之一。标签确实可以缔造越轨者，甚至成为犯罪的诱因，去标签化成了解决犯罪问题、校园欺凌问题的关键，同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意义。

（二）期望：学校标签的产生原因

在学校场域之下，教师往往会对学生产生一定的期望，并且通过学生对期望实现程度的不同来人为将学生进行标定。从学校教育生态环境的创设角度出发，徐代珍和向东春在其研究中指出：不同期望会使教师产生区别对待学生的行为^[10]，教师期望动态化与多元化有利于合理地发挥标签的作用。与之相反，陈良则落脚于学校教育失误，认为其是后进生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原因^[11]。教师的期望不再是划分与标定各种学生的依据，而是在强化学校教育的失误，以不平等的方式为不同学生贴上不同的标签。以上围绕期望的阐述，针对的是不同的主体。前者突出的是期望对教师行为的影响，进而作用于学生的过程；后者则直接以“学校教育失误”的问题为导向，分析期望对学生产生的后果。

（三）公平：学校标签的另一面向

标签理论对学校场域下教育问题的诠释，与教育公平的议题息息相关。首先，教师在学校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会影响教育公平的实现。龚雪认为，学校场域中的教师是社会的代表，可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学生进行评价，为学生贴上各种标签^[12]。这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分层的预演。其次，学生在学校场域中对标签的切身体验关乎

其对教育公平的体验。贾海超分析了标签理论下学校教育问题形成的过程，并且指出被贴标签的学生不仅会有一种受辱的体验，而且会被学校和教师从正常化的群体当中分离出来^[13]。这些体验，使学生们体察到标签化的教育是有失公平的。再次，学校标签通过教师期望的运作，对教育公平产生影响。蒙春妹以一所高中的个案研究为例，剖析应试教育下学校标签泛滥的现象。教师依据家庭背景、学生成绩与行为表现、自身期望为不同学生贴上的标签，人为地制造了教育中的差异，影响教育公平的实现^[14]。最后，因材施教的理念与标签化界限不清，可能会制造教育不公。郑莉芝提倡划清二者之间的界限，避免标签化带来学生待遇上的悬殊对学生造成的心理伤害，积极引导学生走出标签化的阴影，真正实现因材施教^[15]。从教师扮演的角色到学生的切身体验，从教师期望的运作到因材施教理念的误用，以上研究爬梳了促进教育公平实现的两大主体及可能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外在因素。

三、标签理论用于家庭教育研究的设想

以标签理论的经典视角审视学校教育过程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涵盖“善用正面标签激励学生”与“避免负面标签打击学生”两种研究角度。这使得运用此理论研究学校教育问题的研究基本饱和。总体来说，标签理论已经充分地发挥了其在学校教育研究中的作用。然而，贴标签并不是学校教育领域中的特有现象，也存在于家庭场域之下。依照以上逻辑，标签理论对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也可从“正面标签对子代成长的意义”与“负面标签对子代成长的消极作用”两个维度来开展。

（一）回顾：标签理论对流动人口及家庭变故青少年成长问题的解释

纪含笑在其对流动人口教育问题的研究中认为，流动人口本就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往往会被社会贴上素质低下、能力欠缺的标签。而流动人口中的妇女和儿童则更是“弱势中的弱势”。流动人口在社会生活的压力中与正轨渐行渐远，在家庭生活中往往会将负面情绪发泄于妻儿身上，引发弱势群体双重去权的问题，即宏观制度上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微观领域面临公平话语权的丧失^[16]。在陈彬莉的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的观点，即承认流动人口在社会生活与教育当中被标签化、问题化的不利处境。但是，在此研究中更加突出的是流动人口内部的异质性，否认了所有流动人口被问题化标签所裹挟的观点。与之相反的是，流动人口也积极地进行着科学化育儿模式的实践^[17]，在家庭教养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教育自主性与能动性。前者关注的是群体的客观处境与利

益诉求,而后者以更为微观的视角关注异质化个体主动对家庭教育进行探索与实践的问题。

家庭变故青少年的问题也同样离不开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周舒阳列举了两例因家庭变故走上越轨道路的青少年的典型案例,旨在说明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潜在越轨者,破除歧视与偏见,不轻易为其贴上负面标签是必行之策^[18]。标签理论以家庭场域下被标定的特殊群体为蓝本,对家庭教育领域下的标签化问题作出不同的阐释,均凸显了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

(二)展望:负面标签在家庭教育中运作的机制

《标签理论对学校教育过程的贡献》一文当中,特别强调了“期待”对学生成长与发展的价值即突出了正面标签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产生与运作的机制。故而,负面标签在家庭教育中产生及运作的机制也可以“期待”为起点来进行分析。学校场域下可以产生皮格马利翁效应的期待往往是积极且合理的,它将学生导向最终的“自我实现”,成为教师期望的样子。但是,家庭场域下亲代对子代的期待,与学校场域下教师对学生的期待有何不同之处?解决以上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家庭场域区别于学校场域的特殊性。从其成员构成来说,包含亲代与子代;从期待的意蕴上来说,这样的期待往往蕴含着更多传统道德的意味,使子代在家庭当中扮演着“顺从者”的角色。家庭成员对子代的期待,有时会因相同的传统文化底色而上升为一种社会共识,将家庭场域的期待转变为一种社会期待。但是基于传统道德的期待,并不是一种完全合理的期待,其中可能会包含不合理的成分。不合理的期待可能是家庭场域下负面标签形成的先决条件。

标签理论从“越轨”的角度出发,去探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偏差行为产生过程及其对社会成员造成的影响,体现的是一种过程性逻辑。家庭教育中的贴标签现象,与基于越轨社会学的标签理论存在诸多共通之处。从坦南鲍姆到勒墨特,从贝克尔到里斯特,标签理论的研究逐渐突破单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桎梏,转向以此理论解释教育问题的研究。在解释教育问题时,标签理论对解释学校教育过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可以增强对学校违规问题的解释力。当下,家庭场域下的诸多教育问题也逐渐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家庭教育中为子代贴标签造成的种种影响也逐步暴露。所以,调整教育研究的思路,将标签理论运用于家庭教育研究当中正当其时且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周舒阳.标签理论对家庭变故青少年成长问题的

启示[J].赤子(上中旬),2015(20):115.

[2][13]贾海超.在标签理论下促进学校教育发展[J].新课程(中旬),2014(01):9-10.

[3]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87.

[4]于波,付美娜.学校教育中标签的产生及其正向功能发挥[J].课程.教材.教法,2016,36(07):40-43.

[5]霍华德·S.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M].张默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8.

[6]张人杰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46-449.

[7]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秘舒,凌旻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75.

[8]宋立.标签理论视角下的青少年越轨行为[J].群文天地,2012(08):201-202.

[9]徐珏.越轨社会学视角下初中生校园欺凌的现状与成因研究[D].深圳大学,2019.

[10]徐代珍,向东春.浅谈标签理论在学校教育中的运用[J].教学研究,2010,33(03):35-39.

[11]陈良.学校教育失误:后进生的成因分析——一种“标签理论”的视角[J].现代教育论丛,2009(01):43-47.

[12]龚雪.从标签理论视角分析学校场域中学生身份重构的现象[J].教育观察,2012,1(08):22-24.

[14]蒙春妹.教育公平视角下学校标签运行的问题研究——基于河池市一所高中的个案研究[J].教育观察,2019,8(18):81+108.

[15]郑莉芝.教育公平视角下的学校标签化问题浅析[J].课程教育研究,2017(24):8-9.

[16]纪含笑.弱势中的弱势群体——标签化越轨视角下流动人口家庭内部的双重去权[J].法制与社会,2008(32):264.

[17]陈彬莉.流动人口家庭教养的去标签化:积极的态度和实践[J].中华家教,2021(04):82-85.

[18]张爱梅.标签理论视角下青少年越轨心理与行为探究[J].人力资源开发,2017(06):179-180.

作者简介:邢嘉月(1998.8-),女,汉族,河南省濮阳市人,硕士研究生,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21级教育学原理专业,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